

郭良平 专栏

中国仍缺乏现代化土壤（下）

李光耀先生认为，中国前进中须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家意识到的还要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是治理问题，尤其是缺乏法治。他说在今天的中国，法治更接近于皇帝的统治；一个大国，小皇帝在广阔的土地上发挥着巨大的地方影响力；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奖励从众的文化习惯。还有通过警句和4000年积累下来的经典文本来塑造思维和语言，这些经典表明一切值得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而且古人说得更好；外国人要充分掌握汉语这种困难的语言，来拥抱中国并被中国社会所拥抱，是极其困难的。这使中国吸引世界其他地区人才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

千万别犯下颠覆性错误

李先生在2006年预测，中国需要至少30到50年的时间韬光养晦、埋头苦干方能真正复兴。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时，是他建议改为“和平发展”，以免刺激他国。他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的认知态度相当放心，但警告说，未来某一代领导人有可能不知天高地厚，头脑发昏，过早翘起尾巴与美国对抗。他认为那就是中国厄运的开始，是颠覆性错误。

在西方打压和脱钩断链的情况下，强调自力更生是任何国家的自然反应。但自力更生也具有误导性，因为它鼓励孤立心态，靠憋一口气而不是改良创新土壤作为回击，并且可能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推动下，在孤立独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长期后果必定是逐渐落伍，因为创新的软条件靠憋一口气是不会改善的。正确的态度和对策应该是“任正非主义”。

任正非主义——坚决赖着不走

华为作为一个公司所受到的超级大国全方位打压，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个超级大国甚至因它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按照许多人的标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是最崇洋媚外的：他曾经从一个知名美国大公司雇了整个管理团队来接管华为，手把手地教会华为人，用美国最先进的管理方法来运作这个公司，向华为人展示文化意义上的、难以言传、只能身教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全盘西化，是崇洋媚外。但任正非的目的，是摆脱和克服华为职工从社会上带来的中式文化软件中的缺陷，并认

“四个自信”应该理解为在四个方面都争取更上一层楼；如果理解为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有误导抱残守缺之嫌。

为这个方法最有效、最彻底。

类似成功范例，还包括新加坡和香港完整保留和继承英国殖民当局留下的法律体系。这对二者的经济起飞起到关键作用：正是因为这个法律制度带来的信心、安全感和可预测性，才能够吸引到许多大公司和高端人才，使这两个弹丸之地在世界经济中的表现突出亮眼。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甚至比在1965年将它开除的马来西亚还大。如果华为职员遇到任总，向他打招呼时显得过于热情，他就不高兴，斥责他们讨好领导。然而，讨好领导是中华实用文化核心中的核心，也可以说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改造员工从社会上带来的文化积习，讲得高大上一些，就是要创造新企业文化。

任正非从不吝啬夸赞美国。他非常感谢那些曾经与华为有过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司。他说，你打压我，我也要向你学习，因为你是最先进的，我不学你还能学谁？这就是坚决“赖着不走”，但不是西化：他不仅不抗拒中华文化优秀因子，还非常推崇中共的红色文化中的一些品质，尤其是在“打江山”时期那种拼搏、牺牲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花大价钱请来有关专家给华为讲授这个传统。他试图将中、西、红三个文化传统中的优点融合起来，以便发展出一种更优秀、更有韧性的企业文化。

民族复兴必须以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为标志。如果过早提出所谓的“四个自信”，并当作口号过泛、过滥地使用，它就很容易沦为表面文章，甚至起误导作用。任正非主义的实质是用你的长处来弥补我的短处，以便我最终能够克服这些弱点。这与自尊自信没有一毛钱关系。泛泛地大谈“自信”，就有可能走上不必要的对抗和抱残守缺的邪路，既学不了他人的长处，也改不了自己的短处。比尔盖茨在回顾创业历程时，专门告诫那些想效法他、走他的道路的人：在你成功之前，你的自尊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对自己也有害无益。我们常说的“弱国无外交”也是同理。盖茨现在的趾高气扬，同他往昔的卑躬曲膝是分不开的。这也是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智慧。

向西方学习的模范生

苏联即使在斯大林的腥风血雨时期也出过大师级人物，如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独自一人设计出宇宙航行的几乎全部技术细节；还有多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沙皇时期的门捷列夫（Dmitri Mendeleev）的元素周期表至今是化学的基础。从彼得大帝时期开始，俄罗斯就全神贯注地全面学习西方；彼得大帝甚至装扮成一个打工者，到西欧各国私访学习。到十月革命时，西方文化、礼仪和思想方法至少在科学界已深入骨髓。日本学习西方学术文化也很到位，至今已有29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在民国时期也出了不少大师级人物，多数在西方留学和游历过。这些都说明西式学术文化风气的重要性。

如果西方对中国科技教育脱钩成功了，中国的科研基础就会被大大削弱，不得不走向孤立的技术发展道路，情况可能比50年代更糟，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堪与美国比肩的苏联老大哥，它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成了美国的sputnik moment，使其进入紧急状态，调动全国资源来追赶。在苏联帮助下，中国到毛泽东去世时，已经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现在中国相当孤立地站在美国对面；要摆脱孤立，就得奉行任正非主义，死皮赖脸也要同美国保持尽可能多的关系，而不是去争那么一口气。因为中国学术界的弱点短期是无法克服的，只能取美国之长来弥补。

赖着不走的目的是融入其中，以求获得长期好处。但这也需要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建立良性互动来实现双赢。这样就有可能成为前沿科技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办法很多，比如利用自己巨大市场的吸引力；充分利用数十年改革开放积攒下来的人脉与合作关系，不断强化和拓展；利用美国转为内向后同其余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毕竟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不可能总是为美国的遏华政策承担成本，况且，美国正在大规模削减它的海外支出和慷慨，这些国家会逐渐感到与美国结盟油水不

大，麻烦太多，时间长了，机会总会出现。

中西之间的理想搭档？

这个世界变了，历史教训（比如修昔底德陷阱）未必还管用。随着全球南方壮大，不用中国去挑战，西方国家自己就会做出调整。尤其是美国会感到，继续担任二战以来的角色有点力不从心，并且好处越来越少，成了个鸡肋的差事，例如特朗普一贯抱怨美国盟友和中国长期揩美国的油。到那时，中美争霸已经意义不大了，两国重归于好也是大概率事情。

“美国第一”的必然结果是它向内收缩，这就会在国际上留下许多空白，需要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来填补。中国自然会参与其中，但那时的世界将更复杂，中国缺乏经验，取美国而代之的好处不大，负担却很重。从国家利益上讲不应该挑头，但不排除想要青史留名的领导人和虚荣心很强的知识分子大力推动中国去揽下国际责任。

西方文化很强势，未必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它强加在人们头上的激烈竞争和内卷，会使越来越多人厌倦或感到力不从心、心焦力悴。躺平会成为反文化，人们也会转而在精神方面追求幸福感和生命的意义。到那时，经过洗练的中华文化就有可能发挥优势，进入世界主流。这是中西搭档之一。在创新和物质生产领域，美国善于变零为一，中国则长于把一迅速发挥到一百；美国善于创新创造，中国善于将成果转化为花样翻新、价廉物美的商品。这是搭档之二。

最后必须说明，本文里的西方是理想化了的，方法论上叫作ideal type，是用来对比出关键的类似和不同，从而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毋庸置疑，西方国家也有种种缺点，有的比中国更严重。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中国是有本钱骄傲的。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真理。革除中华文化中的陋习，有选择、有重点、有目的地采取外科手术式文化输入，在华为、日本、香港、新加坡等案例上都证明有效。不要纠缠中西而要着重实效。

“四个自信”应该理解为在四个方面都争取更上一层楼；如果理解为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就有误导抱残守缺之嫌。用理想化了的西方这面镜子照出中国的弱项，就有了方向感和行动纲领。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